



費甲

俄共十月革命七十週年

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適值俄共十月(俄曆)革命七十週年，蘇共中央與蘇聯政府擴大舉行慶祝活動。十一月二日，蘇共中央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聯合慶祝大會，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發表「十月與改造：繼續革命」的專題講演。三日，繼續舉行聯合慶祝大會，總計兩天共舉辦五場大會，均由蘇共黨政要員輪番主持和發表講詞，並且邀請其他國家共黨領導發表簡短講話。十一月四、五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七八個代表團，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及其他運動、組織等左派團體；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交換有關當前問題的意見。在兩天的會談中，有一一九個代表團登記準備發言，有六十三名代表獲得發言機會；最後決定所有未發言者提出書面資料及已發言者言論均刊登在真理報上。

十一月六日，戈巴契夫及其他蘇共領導以酒會招待駐蘇使節團，並接受各國駐蘇使節的慶賀。十一月七日，在紅場舉行閱兵典禮和遊行。蘇共領導及各國觀禮貴賓站在列寧墓上觀禮，蘇聯國防部長雅佐夫(D. T. Yazov)循例擔任閱兵主持人。同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酒會招待蘇聯各界領導和外國貴賓；越南共黨總書記阮文靈代表來自一二〇個國家、一七八個代表團發表祝辭。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循例在十月慶典頒發「全蘇社會主義競賽先進勞動者」、「科學與技術」、「文化、藝術、建築」三大類國家獎章，給予傑出得獎人。

此次慶祝活動以戈巴契夫的專題演講和各國政黨代表團會談最受矚目。政黨會談表現蘇共在國際共產運動的新作風，其特點：一、各黨派之間的平等地位，百餘政黨領導自由發言，無特定主席席位。二、會談之舉行係事先取得出席政黨同意，參與黨派不限共產黨，其他應邀參加十月慶典的社會民主黨、自由黨派均可參與會談；顯見蘇共將其黨際關係無限擴大。戈巴契夫表示，不僅是兄弟黨、共產黨人，而且社會黨人、社會民主黨、工黨和其他政治方向的代表人士，都應邀參與合作，共同追求和平事業。蘇共顯然有意藉著與所謂進步政黨的聯繫，擴大其對外政策的影響力，加強和平宣傳。戈氏甚至宣稱「新思維」是新道德、新精神。其目標是每一個人，每一國家的公民、黨員、民族運動積極份子，都應當對全世界抱有責任感。

蘇共對黨史評價與平反問題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十一月二日的專題演講涉及黨史、現行改造政策與對外政策三大部份，但以黨史部份最為突出。這是蘇共中央首次正式評價革命後七十年歷史，不僅評定歷任領導人功過得失，並且計劃恢復歷史上受迫害人物的名譽，平反他們的冤案。戈巴契夫說明在改造開展之際，特別需要正確的評價歷史；這是為了從過去的錯誤吸取教訓。

關於托洛茨基與托派問題，蘇共仍未改變史達林的說辭。但却承認布哈林、捷爾津斯基 (F. E. Dzerzhinsky)、基羅夫 (S. M. Kirov) 等人在反托派鬭爭的貢獻。關於農業集體化問題，戈氏認為是正確的，錯誤在把一些中農認定為富農。關於史達林個人，他認為史某個性極其矛盾，承認史達林支持社會主義、保衛蘇聯祖國的貢獻；但認定史犯了政治錯誤、獨裁、專權橫暴，使蘇聯人民蒙受重大損失及惡劣影響。史達林和其周圍的人物對蘇共和蘇聯人民的鎮壓、專橫、違法犯紀是不可原諒的。當年受迫害的黨員、幹部、學者、專家、文化人士相當多，而且都是因虛構罪名受害的。因此，蘇共中央決定成立委員會重新審查早期的著名案件和檔案，平反受害者名譽。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戈巴契夫宣稱蘇德互不侵犯協定並非大戰爆發原因，日本侵華（佔領東北、華北及七七事變）、義大利侵略衣索匹亞（一九三五年）和阿爾巴尼亞（一九三九年）、德義聯合干涉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三九年），實是大戰起因。

關於赫魯雪夫問題，對其勇於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恢復社會主義法紀、修正往昔對內和對外政策模式，予以積極評價。但亦批評赫魯雪夫犯了主觀錯誤，在舊有的政治與經濟機制影響下，在政策實施方式出現冒進主義。關於布里茲涅夫，肯定其在經濟改革、開發新地計劃、提高經濟力量的努力，以及在鞏固國防、樹立國際威望、維持美蘇軍事戰略均勢的貢獻。但對布氏晚年活動傾向形式主義，未反應實際、言行脫節，社會風氣敗壞，經濟成長遲滯加以批評。他甚至認為布里茲涅夫晚年時期的蘇聯情勢是瀕臨危機的情勢。

顯然，戈巴契夫基於目前蘇共推行改造的需要，而積極地解決民主化、法制、公開、克服官僚主義等問題，並重新評價歷史與歷史人物。如果對過去錯誤的歷史不能揭發，對過去受害的千百萬人民不能平反，那些歷史包袱將成為蘇共改革的阻力，將反證戈巴契夫的改革是錯誤的、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然而，修改黨史與平反冤案的幅度和深度不易處理；稍一過火，難免出現否定馬列主義和蘇共本身，證實它們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因此，戈巴契夫評論歷任領導人採取又肯定又否定的功過兩分法；並且認為過去的命令行政體系對歷史錯誤應當負起部份責任，強調改革所要建立的人民自主管理體系將可消除官僚主義、權力集中的積弊。

克里姆林宮權力鬭爭真相

蘇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廿一日召開全會，新聞公報簡短地說明全會審查與十月革命七十週年及當前一些任務有關問題，並未如往昔刊載會議詳細內容或蘇共領導的談話、演講辭。隨後即謠傳莫斯科共黨第一書記、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葉爾金 (B. N. Yeltsin) 曾發言辭職。事實真

相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市委部舉行市委員會會議才獲大白；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親自出席市委會，說明十月中央全會經過。

戈巴契夫指出，中央全會一致贊同關於七十週年慶祝會的措施，亦即同意戈氏準備在十一月二日的專題演講內容，這是政治局決定的，認為有必要再度評價改造過程。但是葉爾金在中央全會却有不同看法，他宣稱戈氏的報告祇是涉及政治局積壓的一些問題，報告未經批評卻獲得完全支持。戈巴契夫認為葉爾金的講話是政治不成熟、極其混亂和矛盾，沒有建設性建議及按實情分析，而且是斷章取義、煽惑性的講話，戈巴契夫批評葉爾金實質上企圖使黨的改造工作受到懷疑，認為改造並未實際推行；按照葉爾金的意見，近兩三年來的改造任務之實現是錯誤的，使黨和羣眾誤入歧途。最反動的是葉爾金企圖歪曲政治局的工作，特別是關於集體領導的性質。葉爾金個人野心超過黨的利益，其作風和方法是假革命的。

在戈巴契夫戴說葉爾金的罪狀之後，莫斯科市委會成員紛紛批判葉某種種過錯和罪行；指責葉某犯了冒進主義、反對黨中央、陰謀分裂政治局、對抗市委會。最後一致決議，葉爾金不能再擔任市委部領導人。葉爾金在自我批判和答辯時表示，他的講話並無任何政治用意，但同意市委會給予的批判；在市委會、在戈巴契夫面前自承是有罪的。十二日，新任莫斯科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札柯夫 (L. N. Zaykov) 主持全市黨活動大會，向

全市黨員通報蘇共十月全會與前一日市委會的決議。

雖然葉爾金解除共黨職務後，任職蘇聯國家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相等於部長職位），尚未完全失去工作機會。但以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貶黜，亦十分難堪。戈巴契夫譴責葉爾金有政治野心，而葉某却指出蘇共政治局沒有民主，蘇共領導不支持他在莫斯科的作為。根據市委會批判葉某的內容，約略發現葉爾金的工作作風相當急躁冒進，但却受阻於官僚主義。由於葉某的個性不穩定、不成熟、可能直接、間接得罪不少人。更令葉爾金不滿的是，在今年六月的中央全會，比他起步較晚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斯留尼可夫（N. N. Slyunikov）和雅可夫列夫（A. N. Yakovlev）晉升為委員，中央書記尼可諾夫（V. P. Nikonov）直升委員。而葉本人仍然是候補委員，未獲戈巴契夫青睞。因此在此次十月中央全會發難，砲轟戈巴契夫領導的政治局積壓工作、沒有民主、改革政策未見實效；從而導致蘇共中央的貶斥。有「政治野心」的葉爾金下臺，證實這是克里姆林宮權力鬭爭的結果。

中共、蘇聯關係新發展

最近中共與蘇聯關係似乎有較明顯的進展，首先蘇共中央委員會給中共「十三大」的賀電和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祝賀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的賀詞；其次是中共「中國對外交協」會長章文晉率領代表團參加蘇共十月革命七十週年慶祝活動，這是六十年代以來首次派代表赴莫斯科參加蘇聯國慶。蘇共在賀電中向中共全體致同志式的問候，並盼望黨大會工作成果豐碩。蘇聯珍視「中國」在反核戰威脅、支持鞏固和平與國際安全鬭爭中的貢獻，並且滿意地指出，兩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領域的努力具有許多相同的方向。蘇共的賀電不僅未被中共拒絕，而且將之公佈；中共似乎不再像往昔般排斥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同志問候。

當蘇共熱烈慶祝革命七十週年之際，中共也作出相應的慶祝活動：「中國」蘇聯東歐學會舉辦慶祝集會，邀請蘇聯大使介紹蘇聯改革情況；「中國對外交協」和「中蘇友協」舉行慶祝招待會；中共的報章連日介紹蘇聯和發表紀念十月革命的專文；中共電視臺連番播放有關蘇聯的紀錄片和節目。這些活動都是近二十年未曾有的。至於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的慶祝酒會更是賓客盈門。

十一月六日，蘇共中央書記杜布里寧（A. F. Dobrynin）接見中共代表團團長章文晉。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葛羅米柯接見章文晉，陪同的有中共駐蘇大使于洪亮、蘇聯對外友好協會主席鐵果什柯夫（V. V. Treshkov）、蘇聯副外長羅高壽（I. A. Rogachev）。葛羅米柯表示「中國」代表團參加蘇聯慶祝會具有重大意義，七十週年慶祝不僅是蘇聯的節慶，亦是「中國」的節慶。章文晉強調中共希望與蘇聯有正常關係，中共正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雙方的任務都是社會主義建設，彼此學習經驗是有益的。葛羅米柯和章文晉的會談還涉及戈巴契夫改革政策、蘇共對黨史的批判評價。

十一月十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德米傑夫宣稱「中蘇關係現在不僅順利發展，而且達到友好國家的水平」。無疑地，蘇聯與中共關係業已有了微妙變化，從中共對蘇共賀電未予拒絕已暗示雙方黨關係的變化。而且雙方無論在內政或外交，逐漸呈現愈來愈多的共同點。中共搞改革與開放，蘇共推行改造與公開；戈巴契夫批判黨史，為受迫害人物平反，與鄧小平的翻案相似。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與新思維和中共反核立場相同；兩者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態度、支持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亦復同軌。雖然雙方在高棉問題仍有爭議，但中共的批評語氣日益緩和。回顧七〇年代中共高唱與美國有平行的戰略利益，亦即同步反蘇；進入八〇年代之後，中共改採獨立自主外交，聲言不依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與蘇聯的關係逐漸解凍。時至今日，雙方之間的言語雖然仍有差異、歧見；不過雙方的行為却顯露著同步平行的趨向，無論在各自的內政上或外交上。雙方甚至同意

交換經驗、相互學習、彼此合作。在彼此互稱同志的融洽氣氛下，相信未來的發展將更具實質意義；同步的行為比言語上的齟齬更有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

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

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十一屆第八次會議在十月十九—二十日舉行，主要議程是：(1)聽取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塔里津(N. V. Tal'zin)，關於一九八八年蘇聯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計劃與一九八七年計劃執行經過報告。(2)聽取蘇聯財政部長高斯鐵夫(B. I. Gos'ev)，關於一九八八年蘇聯國家預算與一九八六年國家預算執行報告。(3)追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大會休會期間頒佈的法令。大會經過兩天會議後，批准一九八八年國家經濟計劃與國家預算兩個報告。

一九八八年蘇聯各項計劃成長指標：國民收入四·三%（一九八七年計劃四·一%，下述括弧同年度），工業總生產四·五%（四·四%），農業總生產三·四%，工業勞動生產率四·五%（四·四%），國營企業與組織利潤七·九%（七·五%），國營與合作社商業零售總額二·六%（五·九%）。一九八八年居民實質所得計劃增長二·七%，職工平均月薪可達二〇六·八盧布，集體農莊莊員自公共勞動的收入平均每月達一七二·四盧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包括集體、私人）二千零二十億盧布，增加三·六%。住宅設計計劃興建一億二千八百九十萬平方公尺面積，可改善一千一百五十萬人居住條件。

一九八八年蘇聯國家預算，歲入總額四、四三六·四五億盧布（來自社會主義經濟的稅收、利潤提成及其他收入佔四、〇七二·五四億盧布）。歲出部份：國民經濟撥款二、四一〇·三五億盧布；社會文化措施一、五三五·五〇億盧布（其中社會保險五八七·〇八億盧布）；國防費用二〇二·四四億盧布；行政管理費用二九·八八億盧布。歲出總額四、一七八·一九億盧布。

大體而言，明年蘇聯的經濟計劃仍強調維持成長，希望在實施國營企業改革過程中刺激經濟發展。奇特的是國營與合作社商業零售額的成長率反比一九八七年的計劃低很多，可能是考慮到：(1)個體勞動法（個人企業）的施行與農業副業自由化將使國營商店的營業受到影響；(2)蘇共中央正在擬定價格改革計劃，屆時將大幅度調高物價，勢必影響消費者消費能力。預算部份，國民經濟撥款佔歲出總額的五四·三%，但比一九八七年的五六·八%顯然降低了。國防與行政管理費用的佔有比例未變，社會文化措施佔歲出總額三四·六%，比一九八七年的三二·三%增多了。雖然比例調幅不算太多，但却具有政治作用，表明蘇共中央注意提高社會福祉。一九八八年蘇聯教育、科學與文化支出佔六一·一億盧布，增加一一·二%，衛生保健與體育支出佔二一·七億盧布，增一三·三%。至於歲出入餘額估計高達二五·八億盧布，但在官方公佈資料並未列舉該項數值。這種情形表示蘇聯財政當局高估歲入，而不敢將高估部份攤入計劃歲出。未來一年國營企業的盈利狀態可能無法達成計劃目標，才會作出高估低出的打算。

至於蘇聯最高蘇維埃本身，雖係等同於西方國家的國會；不過蘇維埃人民代表的職權遠遜於他國的議員。半年一次的會期祇有兩天，居然要審議、批准國家經濟計劃和預算，未免如同兒戲；徒見蘇維埃的橡皮圖章作用。儘管蘇共再三表示應當加強蘇維埃的角色，却遲遲未見根本的興革。